

去年我国人均住院花费 4874元

比2006年增加355.9元,上涨7.9%

本报讯 根据卫生部6日公布的2003至2007年我国卫生发展情况简报,2007年,我国住院病人人均住院费用比上年增加355.9元,上涨了7.9%。

由于2007年价格总水平涨幅较大,病人医药费用也在上涨。医院门诊病人

人均医疗费128.7元,比上年增加2.8元,上涨2.2%;住院病人人均住院费用4874.8元,比上年增加355.9元,上涨7.9%。扣除物价影响因素,人均门诊费用减少2.9元,下降2.3%;人均住院费用增加141.5元,上涨3.1%。

全国卫生机构数2007年底达31.5万个,比2003年增加2.4万个;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由2003年1.48人增加到2007年1.56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由1人增加到1.12人。

简报还透露,我国居民期望寿命已

经由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2005年的73岁,婴儿死亡率由2003年的25.5‰下降到2007年的15.3‰,孕产妇死亡率由2003年的51.3/10万下降到2007年的36.6/10万。

据《北京晚报》

江西大学生“赵C”为姓名权告公安局

本报讯 近日,因姓名问题被第二代身份证遭拒,正在贵州读大学的鹰潭人赵C向鹰潭市月湖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当日,法院受理了此案。

赵C在诉状上称,1986年7月18日,他在鹰潭市月湖区出生,出生后用“赵C”进行户籍登记。2005年,他又用“赵C”申请第一代身份证,当年6月16日月湖公安分局签发身份证。

赵C的父亲赵志荣说,之所以给儿子取名“赵C”,是想寄托自己一种希望。据介绍,他自己的英语没学好,儿子出生后,他认为人一辈子至少要学两种文字,首选汉语和英语,因此想在儿子名字上做点英语文章。他想,在英语中,“C”是“china(中国)”的第一个字母,又有“西方”谐音的意思,因此告诫儿子最好能到西方国家留学并学有所成,但又

不能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另外,以“C”开头的单词最多,有人丁兴旺之意。

2006年8月份,当赵C到月湖公安分局江边派出所换发第二代身份证时,民警却告诉他,说公安部有通知,名字里面不能有“C”字。后来到月湖公安分局户政科了解,告知“赵C”进不了公安部户籍网络程序,建议赵C改名。

赵C认为,自己的名字简单、好记、好听、不重名,很快就能让人记住,同学叫起来也亲热。2007年7月6日,他向鹰潭市公安局申请,要求继续使用“赵C”姓名。当年11月9日,鹰潭市公安局作出批复,也要他改名。

如今,赵C仍在用第一代身份证,很快他就要毕业参加工作,他担心,自己从小到大的档案姓名都是“赵C”,万一以后再改名的话,他连自己究竟是谁都解释不清。

据《江南都市报》

“人造太阳”今年开建 中国将承担百亿投资

本报讯 我国出资总额高达100亿元的“人造太阳”计划将于今年在法国的卡达拉舍动工,这是近日召开的东方科技论坛上传出的消息。

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院士透露,目前在上海,交大等高校都有专家从事该项目研究,并将承担起为我国参与“人造太阳”计划输送人才的重任,他同时呼吁上海要大力培养该方面毕业生。“人造太阳”的真名叫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建设工程,作为当今世界迄今为止最

大的热核聚变实验项目,它旨在地球上模拟太阳的核聚变,利用热核聚变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在此次论坛上,ITER计划中国办公室副主任罗德隆介绍,自我国在2003年加入了ITER计划谈判,截至目前确定最终承担总投资近10%的费用,即100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中包括约50亿元人民币的工程建设费。尽管投入巨大,但同时我国也将享受该计划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全部知识产权。

据《东方早报》



市民在昌吉市人民公园冰灯艺术节上参观冰灯作品(1月6日摄)。1月6日,新疆昌吉市人民公园第六届冰灯艺术节开幕,姿态万千的冰灯作品与雪景相互映衬,吸引市民前来观赏。

新华社发

世界武术格局悄然变化 中国霸主地位受到挑战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武术运动在世界范围的深入开展,世界武术运动的格局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中国武术世界独尊的地位已经日益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作为国家散打队主教练张根学向记者分析了现在世界武术运动发展的格局。

张根学说:“俄罗斯、埃及、土耳其、韩国和越南近年来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说他们还没有达到和中国抗衡的高度,但在某些级别上已经对中国队构成了威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武术运动要想继续发展就得敞开国门,多和别人交流,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同属亚洲范围的韩国和越南,基

本走得都是中国队的路子,因为运动员自身的条件限制,他们把技术、技巧放在了第一位。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日前已经在个别级别上形成了和中国队抗衡的局面。

对于武术运动呈现出来的这种多元化的局面,其实中国的武术人在感受到危机的同时,也应感到欣喜,因为这至少说明发源自中国的武术运动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的关注。国家散打队总教练张根学的总结很到位,“要想让中国武术在继续为世界所接受的同时立于不败之地,最好的办法就是创新”。而创新的捷径就是将古老的武术招式不断巧妙地应用在现代武术中。

据《三秦都市报》

一项调查显示 七成职场人不了解《劳动合同法》

本报讯 尽管《劳动合同法》从起草阶段就备受关注,但广大劳动者对这部已经开始实施的法律似乎并不很了解。智联招聘近日对近万名公司员工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职场人并不了解这部法律,三成多人参加工作仍然未签订合同。

或是自己通读了法条的职场人不到三成,而其余大部分人对法律规定的内容并不了解。近半数职场人是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到一两条焦点条文。超过两成的职场人只听说过该法律颁布,并不知道其中过多内容。

尽管新年前有很多公司针对新法采取了措施,然而从调查结果来看并不

乐观。除了21.3%的职场人认为公司一直都规范外,仅有16.7%的人表示公司有所转变主动给员工签了劳动合同,另外还有超过六成的劳动者并未从中受益。除了有裁员以及建议员工主动辞职,超过三成的职场人表示,目前参加工作仍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据《北京日报》

近四成大学生为打游戏买电脑

本报讯 九成多玩过网游,两成多自称网游上瘾……6日,羊城晚报与中国反不健康网游志愿者同盟联合进行的“大学生网游状况”调查显示,网络游戏已普遍地走进大学校园,并成为大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

此次调查在中大、华工、华农、华师、广工等六所高校随机抽取300个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显示,91.21%的大学生玩过网游,其中“有过通宵玩网游经历”的80.07%,有11.03%的人“经常玩通宵”,受访者一次连续玩网游的最高纪录是40小时。

调查显示,大学生在宿舍玩网游最多,占39.47%,其次是网吧(21.35%)和家里

(15.41%)。采访中,学生们表示,向父母要钱或自己攒钱买电脑的主要原因,是想用来学习。但调查显示,对于“您的电脑主要用来做什么”问题,37.42%的人表示“打游戏或聊天”,只有31.28%的人用来“学习或查资料”。而42.78%的受访者表示“父母、老师不知道自己玩网游”。

对于迷上网游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大学生生活宽松自由,不像中学那样监管很严(21.39%);网游可以暂时逃避现实(20.03%);网游很吸引人(18.03%);大学里玩游戏成了一种风气(13.16%);大学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让我从游戏中走出来(5.83%)。

据《羊城晚报》

时政点击

春节临近,“空巢老人”更须关怀

1月5日上午,北京一位80岁的老太太从4层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出门买菜归来的保姆见状,抱着老人痛哭不已。据保姆说,这两天因为她准备要回家过春节,老人不走,前天晚上还为此事哭了,没想到昨天一早就发生了悲剧。(1月6日《北京晨报》)

据悉,这位轻生的老太太是位空巢老人,虽有儿女却没有生活在一起,平时与保姆相依为命,几乎到离不开的程度。老人由于失明,生活上对保姆的依赖,造成老人产生了“保姆走了,她的日子也没法再过去”的想法,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又一起发生在空巢老人身上的悲剧!近年来,有关空巢老人的悲剧和新闻还少吗?有老人在家中悄然死去,经过好长时间才被人发现;有老人为让儿女回家而故意挥刀自残;有老人为让子女常回来看望自己,设立“子女探望奖”;有老人在节日付费请子女回家吃“团圆饭”……老人老思亲,子女是老人最大的寄托,我们理解老人们看似怪异行为背后的苦衷!的确,在如今空巢家庭日益增多的社会里,越是临近春节,“常回家看看”正成为老人们发出的最强烈的呼唤。

一位老人就这样走了,在我们悲伤的同时,也该有更多的反思。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对精神赡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很多老人自己可以过清贫的生活,但却不能忍受漫长的对在外孩子的思念,他们最想得到的并不是儿女寄来的汇款单,而是拉着子女的手,摸着他们的脸庞。特别是在春节这样的节日里,这些老人最渴望的是亲情的温暖,最盼望的是与亲人共享天伦之乐。“找点时间,找点空闲,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和家庭规模的日趋小型化,空巢老人越来越多。有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空巢老人有2340万之多,约有1/3的老年家庭出现空巢现象。专家预测,50年后我国老年家庭的空巢率将达到90%,空巢家庭将会成为社会面临的突出的老龄问题。因空巢引发的老年人身心问题和疾病增多,上海的一项调查表明,上海有5%到15%的老人经常产生害怕、孤独、抑郁等心理问题。“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成为空巢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空巢老人问题已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全社会的痛。

又快到春节了,我们做子女的,是不是该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看看! 孙瑞灼

休闲的经济学解释

在上一年中,很多人开窍了似的,重视起自己的休闲权利。就是说,在本土休闲发展史上,人们从来没有如此重视个人的休息度假权利,或从相反的意义上讲,人们的休闲从来没有被赋予这样被关注的机会。(本报1月4日报道)

休闲,先得有闲暇。而闲暇,按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说法,既是“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愿意去支配的时间”,还是人们“个人特色的源泉”。在现实中,不知有多少人时常慨叹活得累,被一个累字折磨。上班累,人情累,生活累,等等,带来了心理累。烦着呐,则是太累引出的一个结果。活得累,是各个阶层的人们的境况。活得累,概因受累的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支配时间。缺少从容,缺少快乐的源泉,使多数人的休闲难见所谓个人特色。

休闲是好事,能给人的身心带来益处,所以人们愿意休闲。休闲,也可视为一个经济学话题,人们可以像进行货币预算一样,安排自己的休闲预算。像萨缪尔森说的,“每小时效用最大化的相同原则能够运用于生活中许多不同的领域”,这也包括休闲。而且,“它不仅是一条经济学的规律,

它是一条理性选择的规律”。对稀缺的休闲配置进行分析,一个人有了时间,在室内室外无事闲呆着,或睡个黑天昏地,都不是最佳休闲。分配好时间,积极地进入个人偏好的天地,发挥想像力,哪怕身体累着,做的却是自己喜欢做的事,如此,才能获取休闲效用最大化。

会休闲,才会休闲好。休闲,也可看成是人的一种能力。生活中,导致人们焦虑的事情太多了。无法排遣这种种焦虑,造成身心俱损,这种悲痛的结局,哪个人都不能替哪个人承受,统统得由自由的个体扛着。选择好的休闲方式,可以部分地化解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焦虑。

休闲,它依赖于好的制度设计。全面推行职工带薪休假制度,体现的是人们休闲权利,无疑是一项好的制度设计。但好制度,不能停留在纸面上,不能是画饼充饥。据调查,有将近70%的人对带薪休假制度的执行不抱太大希望,超过80%的人说他们过去并没有享受过带薪休假制度。好制度下的悠闲不呈现轻松、轻盈的内涵,对于那么多人的人是水中月、镜中花,这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休闲二字在本土的沉重。

罗金羽



漫画:新居的钥匙

近来有些地方楼市趋冷、房价趋降,房价“拐点”一时成为一个热议话题。房价“拐点”是否到来?各方吵来吵去,莫衷一是。这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群众缓解住房困难的翘首期盼,值得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百姓急盼房价“拐点”,其实是急盼赶快摆脱眼下的高房价煎熬,真正租得上房,买得起房。这正好提醒有关部门怎样才能尽快为老百姓解住房之困,切实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住有所居”的目标,尽快建立住房保障体系。这才是民本政府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工作“要点”。

新华社发

教育投入连年亏欠 当以何为解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日前公布的2006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有1/3的省份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经费增长要求。

应当说,过去几年来,伴随着舆论关于民生问题的讨论,各级政府逐渐增加教育的财政投入,但几年下来,4%的法定目标依然没有达到,尚有近一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一个百分点是什么概念?2007年,GDP总量约在23万亿元,1%就是2300亿元。全国学生目前是两亿多,这笔钱摊到每个学生头上约1000元。

在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地方财政支出中的相当大比例用于教育。这并不一定是因那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从个人立场上多么重视教育,更主要的是因为财政收入该怎么花,是由民众或者民众通过其代表决定的。

但是,按照现实的财政体制运转机制,地方政府怎么花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官员决定的,他们的选择当然会有不少与当地民众、与人大代表相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会与民众及其代表不同,比如,对增加教育的财政投入,一些地方官员就未必热心。

怪罪地方官员的认识水平无济于事。制度决定人的选择。而在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负责人的任期相对较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选择容易快速做出政绩的项目,而教育显然不属于这一领域。

因此,保证教育投入,只是呼吁或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比如问责,确有一定用处,但治本之道还是建立、完善民主财政制度,真正让地方民众决定地方政府的钱该怎么花。

因此,各级政府如果要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改革财政制度,完善财政监督制度,让民众直接或通过其代表参与支出选择。只有财政民主,才能保证教育投入令人满意地增长。 京文

公共品“富人搭穷人便车”本是常态

从教育到交通,再到最基本的水、电、热,这些都属于每个人必需的公共产品,政府只能以绝大多数人的平均承受力为收费标准,以社会最弱者的支付能力为参照系。由于转移支付的滞后性和补贴的间接性、不确定性,绝大多数国家在公共品供给上都选择了以低价尽可能让更多人消费得起公共品,而不是依赖高收费之外的补贴,“富人搭穷人便车”是无奈的选择。

近来经济学家茅于軾又语出惊人,鼓吹中国大学应该该收费:如果降低高校学费,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

个便车。(1月6日《南方都市报》)在这之前,张维迎同样的观点曾引起舆论激烈的抨击。实际上不仅张、茅持此论,以“富人搭穷人便车”为由鼓吹公共品涨价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惯常的论调。他们认为:很多公共政策,以穷人的名义制定,但是穷人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富人却搭了便车。例如油价,中国当前汽油价格相对说还是比较低的,但汽油一要提价就受到“穷人负担不起”的指责,实际上马路上开车的大部分人并非穷人,低价位受益最多的是富人;现在社会上炒得比较热的几项费

用,比如教育、交通、住房,还有最基本的水、电、热的价格,都要防止富人搭穷人的便车。

防止富人在低价中搭穷人便车——这个涨价理由看似没错,其实不然。因为公共必需品上的“富人搭穷人便车”,这就是一种正常状态,是政府为了满足公众基本的公共需求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不管最发达的国家还是最穷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是如此。为了让大多数人用得起起码的公共品,尤其是支付能力较差的穷人,政府必须尽可能维持公共品的低价,富人因为支付能力较强,当然就搭了穷人的便车。

从教育到交通,再到最基本的水、电、热,这些都属于每个人必需的公共产品,所以在这些公共品上,政府只能以绝大多数人的平均承受力为收费标准,以社会最弱者的支付能力为参照系。如果以富人支付能力为标准定价而实施高收费,富人是搭不了穷人的便车了,社会大多数人就用不起、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了。

解决公共品上“富人搭穷人便车”的问题,只能向富人更多征税的方式完成,而不能提高公共品费用——因为那样会置更多于消费不起公共品的危险境地。 曹林